

中国文明视角下的历史叙事与全球秩序再思考

高山

江苏警官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2

DOI:10.61369/SE.2026070026

摘 要： 本文以中国的文明视角重新审视“西方”，在认真研究西方主流历史叙事和经典文献的基础上，对欧美话语体系下“西方崛起具有唯一性与普遍性”的核心假设提出批判与比较。中国对于西方的理解并非线性地随国际格局变化而调整，而是深植于自身的历史记忆和政治文化传统。通过对四个关键历史阶段，即帝国时代、屈辱时代、改革时代、复兴时代的分析梳理，展示了中国从文明自信、到创伤被动、再到务实深思，最终迈向文明复兴的复杂认知转型。在广泛对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 worldview，构成了超越西方例外论的重要反叙事。

关 键 词： 中国文明视角；西方例外论；中国方案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Rethinking Global Order from a Chinese Civilizational Perspective

Gao Shan

Jiangsu Police Institute, Nanjing, Jiangsu 210012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West" from a Chinese civilisational perspective. Drawing on a close engagement with mainstream Western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canonical texts, it critically and comparatively examines the central assumption in dominant Western historical discourse that the rise of the West represents a unique yet universally applicable historical trajectory. China's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 has not evolved linearly in response to shifts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Rather, it is deeply rooted in China's own historical memory and traditions of political culture. By tracing four pivotal historical periods, namely the imperial era, the era of humiliation, reform, and the era of rejuvenation, the article reveals a complex cognitive transition from civilisational self-confidence to trauma-induced passivity, then to pragmatic reflection, and ultimately towards civilisational rejuvenation. Developed through sustained dialogue and critical engagement, the Chinese worldview articulated in this article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ounter-narrative that moves beyond Western exceptionalism.

Key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al perspective; Western exceptionalism; Chinese approach

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往往将西方的崛起描述为一种独特的优越文明的必然展开，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创新，长期主导全球经济秩序，通过掌控全球文化权，将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塑造为“普世价值”，实现规范全球的主导地位。然而，全球治理倡议正推动打破“现代化 = 西方化”的迷思，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通过平等对话超越文明冲突。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强调文明平等互鉴，为构建多元文明新秩序提供新路径。本文通过中国独特的文明和政治传统视角批判性地审视“西方”，并在认真研究西方主流经典文献的基础上重新检视其叙事逻辑，分析认为中国的观点是由其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世界观塑造的，是对全球权力动态的主要欧美中心主义解释的重要替代。

本文并非简单从中国立场回应西方叙事，而是梳理西方学术界主流及高影响力研究，对西方自身的解释体系进行审视。研究表明，地理优势、获得煤炭和殖民地等资源的偶然因素是西方崛起的关键，而不是固有的文明优越性；西方与东方思维模式的差异也削弱了“单一路径现代化”概念。总体而言，正因大量依托西方核心文献并进行学理重构，本文的分析更具跨文明比较的说服力，并自然与中国对世界历史和当代国际秩序的理解相契合。

为方便系统化研究，本文按照学界通用历史划分并结合重要事件，从四个历史哲学阶段进行考察，每个阶段都探讨了中国的史学和不断演变的文明观是如何塑造其对“西方”的感知和批判的。一是古代帝国时代的中国（1840年之前），自信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将西方视为边缘；二是近代屈辱时代的中国（1840年-1949年），以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为标志，它创伤了中国，并激发了人们对民族

复兴的热切追求；三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1949年-2012年），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将西方定义为帝国主义的“他者”，有选择地接触西方现代性的各个方面；四是以复兴为特征的新时代的中国（2012年至今），对文明身份越来越有信心，并对西方模式公开进行客观审视与理性探讨。

一、帝国时代（1840年之前）：中心主义与早期的西方认知

在19世纪的变革性遭遇之前，中国对西方的看法深受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的影响。这个较长时代的特点是坚信中国是“中央王国”，代表了全球文明无可争议的中心。在这个框架内，像欧洲这样的遥远地区及其居民并没有被视为平等的竞争对手，而是被视为中国庞大的宇宙和政治秩序中的外围实体，即“天下”^[1]。这种既定的概念结构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中国人最初与西方人的互动和对西方人的解释得以过滤。

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的思想基础，通过治国方略和史学得到了精心强化。被尊为“天子”的中国皇帝被认为是受上天授权统治者，其责任延伸到天下所有人民。人们期望外国政治通过参与朝贡体系来确认这种道德政治秩序，朝贡体系是一套复杂的仪式化交流，超越了单纯的政治或经济外交，而是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明机制发挥作用^[2]。有鉴于此，早期与西方游客的相遇是通过中国长期以来的朝贡方式来解读的。通过进贡任务，外国使节进行了磕头等仪式性的行为，从而肯定了中国文化优势和皇帝的最高地位，这种方式本质上区分了文明的重要内容。

有鉴于此，早期中国与西方游客的相遇是通过长期以来的朝贡方式来解读的。16世纪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和1793年的马嘎尔尼使团等欧洲抵达者通常被归为外国人的既定类别。由于他们在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利玛窦和他的同行在朝廷中获得了一些青睐。然而，这种选择性的欣赏并没有挑战人们对中国文明优越性的普遍信心。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西方奇迹”或迫在眉睫的系统性威胁。

事实上，直到18世纪末，中国才意识到相对于西方的重大发展滞后。西方孤立的技术进步，如高级船炮虽被注意到，但往往被视为聪明伎俩，而非基本文明挑战的指标^[3]。正因如此，中国与西方的早期接触充满了深刻的误解，双方都通过不相容的认知框架来解释彼此。这种持久的文明自信和对外部变化的低敏感性，使中国对19世纪突然出现的西方挑战的规模和性质准备不足。

二、屈辱时代（1840年-1949年）：创伤、变革与西方的新视角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叶，中国集体记忆不可磨灭地被铭刻为“百年国耻”，以连续的军事失败、不平等条约的强行签订，以及西方列强和后来的日本侵略的半殖民统治为标志，从根本上打破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它迫使人们对“西方”进

行痛苦的重新评估，此时西方既被视为生存威胁，又被视为对国家生存至关重要的现代力量来源。因此，中国的叙事被理解这种权力不平衡、抵抗外国侵略和恢复民族尊严的努力所主导，中国成为一个正在努力自强的受害文明。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在中国史学界几乎被一致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创伤开端。这场战争赤裸裸地暴露了清朝的脆弱性，最终被迫签订《南京条约》（1842年），这是众多“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通过割让领土、开放港口、授予治外法权和施加赔偿，系统地侵蚀了中国的主权。这开启了一个残酷的外国入侵模式，包括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失败等，所有这些都突显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没落崩溃。

西方侵略的冲击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反思。19世纪末中国因而出现了摇摆不定的反应，自强运动试图采用西方技术“西学为用”，但要保留中国的社会文化精髓“中学为体”。然而，保守的抵抗和结构性问题阻碍了这些努力。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五四运动（1919年）期间，最初接受了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思想。然而，西方对所谓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倡导与其帝国主义实践之间的明显矛盾导致了深刻的幻灭。西方的繁荣建立在殖民主义的基础上，这种叙事继续为中国人对全球历史的看法提供信息。西方的主导地位源于胁迫，而不是固有的优越性。

值得注意的是，“百年屈辱”叙事也成为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基石。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奋斗，1949年结束了这个时代，恢复了国家主权，“百年屈辱”正式宣告结束，但其心理印记是深刻的。中国以钢铁般的决心重新确立其全球地位，并确保永远不会再遭受这种侮辱。这一决心是在一个世纪的受害和斗争中形成的，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随后与西方的交流。

三、改革时代（1949年-2012年）：复兴、务实的西方立场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标志着“百年屈辱”的结束，以及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国家主权的主张，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能够抵抗西方压力的独立主体的重新崛起。特别是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建立后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为中国赢得了长期和平发展期，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再到改革开放，直至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中国对西方的看法是不断发展的，在务实考虑的基础上，于复杂相互作用中形成。在尖锐的对抗言论中，中国一个潜在的目标是在国力

上超越西方。在1949年至2012年的较长时期，中国的主流叙事阐述其对过去西方帝国主义的胜利，但也着重强调继续保持警惕和力量的必要性，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新中国建国初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生存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先前征服中国的帝国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中国把美帝国主义视为“纸老虎”，带动了全球反殖民运动。因此，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主义实质为“资产阶级”的建构，是掩盖精英利益和帝国主义野心的欺骗性工具。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相对孤立，加上强烈的西方宣传，巩固了双方的敌对看法。

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开始了深刻的调整，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化改革，大力推动现代化建设，促进与全球体系的经济一体化，包括加入世贸组织等。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大国，在借鉴西方技术和市场的同时，对西方的政治意图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这种务实接触和深刻思考的结合塑造了中国对西方更加自信和批判性的看法。

四、复兴时代（2012年至今）：历史性成就与“东升西降”的叙事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这场起源于美国并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危机，赤裸裸地暴露了西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弱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充分展示了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和长期规划的制度优越性，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制度自信，也进一步表明中国有意承担更积极、更具影响力的国际角色。

因此，“东升西降”的概念，即东方正在崛起西方正在衰落，获得了显著的牵引力。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是自世界“大分流”以来的新近发展现象，反映了世界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当然，在全球产业链重组、能源转型、数字化革命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背景下，经济重心变迁轨迹远比“东升西降”的线性逻辑复杂。新形势下，“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肩负重大发展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将被赋予新的发展时空内涵。

中国自信转化为重塑全球治理的切实努力。2013年启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等举措表明，中国有志于为国际合作与发展创造新的平台，这与西方主导的制度规范和条件不同。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提出，立足中华文化“天下大同”的传统智慧，又赋予其时代内涵，科学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客观现实，倡导以和平发展超越冲突对抗、以共同安全取代绝对安全、以互利共赢摒弃零和博弈，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理念的提出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回应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深度交融的现

实需求，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方能应对，而中国通过倡导平等对话与文明互鉴，推动了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它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不仅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锚定了方向，更在联合国等国际平台获得广泛认同，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

五、结语

本文在研究西方主流叙事与经典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中国自身的文明与政治文化视角，对“西方”进行了重新审视并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新解释路径。通过对四个关键历史时期的梳理，展示了中国理解西方的方式并非简单的被动反应，而是在文明自觉、历史经验与国家目标的共同作用下不断重构的认识框架。这种分析方法使我们能够看到，在中国的历史叙述中，西方崛起并非线性必然，也非源自固有文明优势，而是由若干结构机遇与全球力量格局的偶然性共同塑造的阶段性现象。

这一视角不仅突破了“大分流”理论中常见的文明决定论，也为现代性提供了多元化的理解空间。西方政治制度与社会价值在此框架中被视为特定文化传统的产物，而非普世范式。与之相对，中国在自身哲学传统、历史经验与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实践，逐步形成了对社会发展与政治治理的解释机制，使得“现代化”不再等同于“西方化”。

从帝国时代的自我中心，到百年国耻时期的震荡性觉醒，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至改革开放时期的务实选择，中国对西方的认知不断演变并积累出新的理论资源。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国家能力提升与治理成效凸显，这一历史叙事进一步汇聚为更自信的判断，中国道路提供了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一种制度与现代性形态，其可持续性与其有效性正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

因此，从文明史和政治发展的角度看，理解中国对西方的重新定位，不仅有助于反思西方叙事的局限，也为认识当前世界力量结构的深刻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更重要的是，这种文明性视角成为当代中国制度自信的思想来源之一，使中国能够在全球秩序重塑的过程中，以更加主动、自觉与成熟的姿态参与现代世界的未来塑造。

参考文献

- [1] Zhao, Tingyang. "Rethin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 'All-under-Heaven' (Tian-xia)." *Social Identities*, vol. 12, no. 1, 2006, pp. 29–41; Chen, Zhimin.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Routledge, 2014, pp. 56–74.
- [2] Hevia, James L.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3] Waley-Cohen, Joanna. "China and Western Technolog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8, no. 5, 1993, pp. 1525–1544.